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书系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YAN'AN SHIQI DE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YANJIU

王 明 著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学、文艺学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也是多层次的，除中共领导人外，很多知识分子也在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研究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实践意义。

广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YAN'AN SHIQI DE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YANJIU

王明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王明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2

ISBN 978-7-219-08461-8

Ⅰ.①延… Ⅱ.①王… Ⅲ.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1935～1948 Ⅳ.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2294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郑　清
责任编辑　覃洁玲
责任校对　陈柳娜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南宁市桂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1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461-8/D・112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 (14)
一、抗战前的中国化思潮 …… (14)
二、新启蒙运动 …… (20)
三、共产国际路线和政策的转变 …… (25)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 (29)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直接原因 …… (29)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35)
三、毛泽东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目的 …… (46)
第三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方法 …… (53)
一、重新定位马列主义 …… (53)
二、照葫芦画瓢 …… (64)
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 (67)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72)
第四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就(上) …… (77)
一、革命道路理论 …… (77)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 (80)
三、党建理论 …… (87)
四、军事理论 …… (93)
第五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就(下) …… (99)
一、哲学理论 …… (99)
二、史学研究 …… (109)
三、文艺理论 …… (119)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影响 …… (126)

第六章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131)
一、干部教育 …… (131)
二、延安整风 …… (140)
三、文艺创作和表演 …… (152)
第七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 (155)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 (155)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 …… (168)
参考文献 …… (174)
附录一:《实践论》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原文对照 …… (181)
附录二:《矛盾论》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原文对照 …… (189)
后记 …… (19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 言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乃至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但“延安时期”这一概念，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的形成仅仅是根据中共中央所在地而形成的，它从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开始到 1948 年 3 月中共中央撤离陕北截止。它并不对应中国革命发展阶段中的任一阶段，而是横跨了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革命阶段。这三个阶段不同的革命对象、革命路线、革命阵营、力量对比、领导核心、社会结构、历史任务等，使得以“延安时期”为研究对象显得过于复杂和分散。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有一点不同，它的目的是要探讨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研究和运用等与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方针、革命实践的互动关系及这种关系的性质，它不是要研究思想路线、政策方针、革命实践本身。从这一点来看，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传播、研究和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共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的影响都具有同质性，而且尽管其横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可以归属一个阶段，即一个持续的、相对独立的、基本健康的和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的阶段，这一历史过程的主体、理论成果、基本特点、历史影响都具有不可切割的连续性特点。这样一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历史阶段是不存在的。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最初到达陕北时，拥有的党员不过三四万人，掌握的军事力量也只有四五万人，地处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人口稀少的陕甘边区。而且面临的军事形势又极为严峻，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央军汤恩伯部、阎锡山的晋军、马鸿逵和马鸿宾的军阀部队从南北东西对红军实施“围剿”。然而仅仅短短的 10 年时间，到 1945 年抗战结束时，中共已有党员 120 多万人，正规军 130 多万人，拥有 19 块解放区，人口近 1 亿。而到 1948 年初，中共中央撤出陕甘宁时，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今非昔比，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开始有利于中共，解放军的战略

攻势已经拉开。更重要的是，经过这 13 年，国民党政权已经众叛亲离、民怨沸腾，中共却众望所归，气象万千。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与中共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与中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法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是无论如何都分不开的。当然，中共及其领导和影响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远不止上面所说，除上述自身的成功外，他们还推动了国内政治民主化思潮的发展、面向大众的文艺创作和表演的繁荣、农业经济的互助合作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蓬勃发展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中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历史阶段之一。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以往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不是已经全面透彻的话，那么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深入探讨就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之一了。

二是想通过本专题的研究拓宽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狭隘理解。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者都理所当然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理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过程。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研究综述中详论，此处不再赘述。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为我们拓宽以往的狭隘理解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事实支撑。因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还有文艺学、社会学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除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外，很多知识分子，比如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周谷城等都明确地或在事实上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大多经过思想解放的五四时代，所以尽管他们都是党员，但在主观上意识形态的禁锢较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基本上能以一种学术研究的客观态度进行，加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是学识渊博、极具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的特点，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另外，一方面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所以尽管毛泽东曾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提出反对自由主义，而且发生了抢救运动那样的事情，但总体来说，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和知识分子的管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解释和选择尚没有一套像新中国成立后那样的严格的政策和规范，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层面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情况。

除了上述动机外，我以为对这一专题的研究，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理论意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是极为丰富的，除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硕果，还有很多闪耀着真理光辉的小花朵、小果实。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习惯于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准去衡量和遴选这些思想成果，把一部分成果人为纳入到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轨道中，其他的则多半扔到了历史的垃圾筐中。这样，无疑既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多元化的事实，又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部分成果。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环境和学术环境的改善，我们应该并且可以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野、新的标准下重新认识和探讨这一历史过程及其成果，总结这一历史时期中共及其所领导和影响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汲取他们的优秀成果，从而为推动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和理论资源。

第二，历史意义。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后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延安时期的经验和成就为基础的。中共在延安时期所积聚的力量潜能，所建立的一整套东西包括政治路线、阶级路线、思考方式、斗争方式等使中国共产党就像顺势而下的江河，浩浩荡荡，无可阻挡，冲垮了国民党政权的根基和原有的社会赖以存在的结构、关系、习惯、伦理、思想等。然而，对于一个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来说，继续一成不变地坚持原有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一整套东西像一根根长矛，指向国民党政权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一些思想正确但需要在实践中完善的制度、政策、关系等），然而当国民党遁出大陆，中国共产党自己成为执政党，那套长于革命和斗争的观念、原则、组织、习惯、方法等对于新政权而言不是都适用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犯一些错误。实际上这些错误的出现，就其性质来讲，大多都可追溯到延安时期党形成的思想和政策。因此，问题在于中共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一整套东西为什么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在中共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中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又何以能够在后来的国共两党的角逐中，为中共凝聚人心和力量，使中共得以战胜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对这些思想、习惯和政策所赖以形成的根源、所得以形成的条件作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才可能给出全面合理科学的解释。唯其如此，也才能够科学梳理从延安时期到解放战争后期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内在逻辑。

第三，实践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很多问题都开始凸显出来，比如贫富差距、官员腐败、学生就业、产业结构升级、群体性事件频发、司法腐败、民族问题等。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面临着可谓前所未有的严峻挑

战，在这些挑战面前，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一个攸关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兴衰的大问题。在这一方面，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身处艰难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环境之中，而且在党内上层存在着宗派、教条主义势力、国际势力的矛盾和冲突，部分党员是有保守封建观念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同时还有大量拥有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知识分子也拥入党内。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自身建设的道路，终于把这样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党建设成了一个团结友爱、令行禁止、集中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队伍。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例如，“这一巨大转型是如何实现的？”“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和方法又是怎样？”“对这一转变过程又是怎样实施有效监督的？”“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其效果又是怎样得到延续的？”等等。我相信，对上述乃至更多的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也必将为解决当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遇到的种种问题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就目前而言，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课题的研究前人从未涉及或者说其是什么学术研究的空白。事实上，恰恰相反，已经有少部分人在专门研究延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外，凡是系统研究和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和教材，乃至论文，无论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界定，几乎都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所涉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对人物的研究和回忆（比如对张闻天、刘少奇、艾思奇等的思想研究）和一些专题研究（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也会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所涉及或作专门章节的论述。下面我将分门别类地概括介绍一些前人研究的成果以及这一问题研究上存在的缺憾。

第一，专门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主要有：张远新等的《试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年第 4 期），肖东波的《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探讨》（《党的文献》2004 年第 6 期），张正光的《论延安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7 期），等。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系统研究和描述的专著、教材和论文主要有：唐宝林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钟家栋等的《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陈希的《民族

复兴之路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沈宝祥的《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北京日报》2007 年 2 月 26 日),黎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资料通讯》2007 年第 5 期),鲁振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 年第 1 期),石仲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贾玉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规律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 年第 5 期),等。

第三,人物思想和思想史研究中(包括对毛泽东思想)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的著作、论文主要有:艾思奇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张培森的《张闻天研究文集》(共三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出版),中共中央党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张远新等的《论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 7 期)、《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彭继红等的《从大众化到中国化:艾思奇哲学贡献新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徐素华的《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李伟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研究》2003 年第 11 期),庄福龄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 年第 2 期),曹泳鑫、吴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构建范式——从毛泽东"38 命题"、后续阐述到当代化"链结"》(《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年第 3 期),等。

第四,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专题研究中对这一课题有所涉 0 及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靳书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国内政治背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 年第 10 期),季荣臣的《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明日报》2008 年 1 月 27 日第 7 版),李建勇的《1938 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动机》(《甘肃理论学刊》2008 年第 2 期),许全兴的《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文献》2009 年第 3 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 年第 3 期)、《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

年第4期),安启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张立慧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徐素华的《〈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视野》2007年第10期),程中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冯蕙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等。

概括来讲,上述研究成果与这一课题相关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背景和动机。上述成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背景和动机主要有:1. 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许全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对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总结,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必然。"[①]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在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已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化民族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问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②]。2. 新启蒙运动。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启蒙运动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季荣臣认为,新启蒙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功不可没。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而且"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无论在本质上、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主体上,都已具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雏形"[③]。许全兴也认为新启蒙运动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的精神,又"提倡文化的民族性,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尊重民族文化、继承中国传统中的优秀内容、纠正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的错误",正是这种对民族性和中国化的强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④] 李建勇等也认为"新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在倡导文化之民族性的基础上,比较广泛地运用了'中国化'概念",对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⑤] 当

①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3).

②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③ 季荣臣.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N].光明日报,2008-01-27(7).

④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⑤ 李建勇,谭业庭.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动机[J].甘肃理论学刊,2008(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然，对于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王彬彬就认为新启蒙运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运动，毛泽东也是这场运动的受惠者之一，“所以，‘新启蒙运动’其实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①。3. 抗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化”思潮。一些文章提到抗战前后“中国化”已经成为关于中国文化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共识，这一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的一个主要发展路向。4. 苏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党内存在的对于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倾向。李建勇等认为由于中共和共产国际存在的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所以当苏共和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党保卫苏联，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并无条件地分析和运用俄国革命和经验时，“便不能不对中共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严重的影响”②。同样是说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鲁振祥则认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到“重点放在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改变，对中国共产党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促进中共领导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③ 张远新等也认为共产国际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上以及共产国际要求各国避免教条地照搬他国的经验的指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外部条件。④ 5. 中共党内的斗争。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的一个手段，旨在同紧跟莫斯科的留俄派进行的权力斗争中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国内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长期酝酿的，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的策略。⑤

第二，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的研究，学术界的观点呈现出明显多元化的情况。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一层、两层、三层甚至更多含义的都有，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与

---

① 王彬彬. 并未远去的背影[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208.

② 李建勇，谭业庭. 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动机[J]. 甘肃理论学刊，2008(2).

③ 鲁振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1).

④ 张远新，贾慧.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⑤ 李建勇，谭业庭. 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动机[J]. 甘肃理论学刊，2008(2).

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其内涵之一[①]。除此之外，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创新意味和表现形式的中国特色。比如张远新等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长期化以及把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文化学术领域的影响。比如许全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而且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②] 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前者的偏颇观点“直接影响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忽视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学习和研究”。[③] 许全兴的看法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用一些新的形式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比如靳书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可以用“一、二、三、四”来概括，即一个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对立统一；二项伟大实践：党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条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四种发展形式：理论传播、理论丰富、理论创新、理论飞跃等等。[④]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揭示由原来的单一内涵趋向于更加丰富。当然，这种现象本身也说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第三，总结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部分成果。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上，可以说这类研究比较多，几乎这方面的著作都涉及了，有的著作甚至把毛泽东思想看作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唯一的成果。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讨论，从内容讲，主要集中在其革命理论、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文艺思想上。从人物来讲，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思想上。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对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的贡献以及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家在史学方面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研究。

还应该说的是，我认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上述成果还存在以下问题，使得

---

① 郭德宏.近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评[J].党史教学与研究，2004(4).

② 许全兴.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4)。

③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3).

④ 靳书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再思考[J].思想战线，2009(4).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扩展和深入下去。

具体来说，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仍然不够全面。从当前的研究状况看，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几乎全部是从党的理论发展的角度去阐述的，对这一传播的历史影响也都是在党的发展以及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圈子里挖掘的，几乎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为中共指导思想形成和发展史来写。这样写自然有它的好处——线条单一，脉络清楚，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但是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或者中国化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者中国化的途径，并不是仅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条。马克思主义传播或者中国化的成就和影响也绝不仅仅是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中共领导人，一些党内知识分子和无党派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程度不同、性质不同的作用，其中有些甚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比较复杂，并不能简单地当成一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认识，这种情况既和在备受外强凌辱的近代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改变中国命运的心态有关，也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的某些特征之间的契合性有关，或者说是和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判断和把握有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革命实践、思想文化，以及当时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等等之间的互相激荡、改造、融合与再生，就绝不是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发展所能涵盖得了的，也绝不是单纯的革命进程所能容纳得了的。这一历史过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执政，更加成为一股宏大与细致入微的特征兼具，革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内容并包，积极和消极的成就皆有的席卷一切的洪流。它给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发展、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辉煌与创伤，以及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普通的外来文化与一种意识形态，其中国化在方式、途径、成果和影响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因此，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般的外来文化，对其与中国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的历程考察，与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的考察，在主体、文献资料、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的维度上也必然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般的外来文化的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是纯粹文化和学理意义上的介绍、学习、批评和创新的过

程，这一过程是由普通知识分子群体来完成的，其成果既体现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各种学术著作中，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观念、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中。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其中国化则主要是由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完成的，其成果体现在党的不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中。前者为后者的创新发展提供雄厚的学术文化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后者则为前者的深入研究创造更宽松和广阔的政策和舆论环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只有两条腿走路，才既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走下神坛，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获得更为宽广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资源，又能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当代化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路径选择。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只有两方面兼顾，才能既弄清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的发展历程、脉络、经验教训，又全面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恢宏历史；既厘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又能明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及其变化与发展。①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背景讨论不全面，没有提到抗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化思潮和思想文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直接影响。有些文章只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实际上主要写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后的情况。还有一些文章把新启蒙运动与中国化思潮混淆起来，其原因很可能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在抗战爆发前后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但事实上二者完全是两码事。首先，中国化思潮的基本出发点是反侵略和自身文化保护，而新启蒙运动中虽然也有反侵略的内容，但其主要出发点还是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和复古主义倾向，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拓展空间。其次，中国化思潮可以说源远流长，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中国化”的概念，而新启蒙运动作为一场运动时间跨度主要在1936年到1937年。再次，中国化思潮的拥护者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涉及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学者，而新启蒙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影响的左翼分子。

第三，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资源缺少研究。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这一时期马克思

① 王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概念问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主义中国化所依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并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本，找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化在理论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中文资料的汇编，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也有一些好的著作，比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和德国学者李博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等。前者的部分章节以及附录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日文资料来源。后者从中文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和概念这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资源的关键问题出发，探讨了中文与日文中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术语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遗憾的是，尚没有著作对这些理论资源本身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二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的研究，以及由这两个方面产生的对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进而探求其对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和改造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多著作中都有涉及，但都不够系统。

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资源的研究，就是对影响中国人接受、传播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国情、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的研究。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却很少有人专门探讨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中国化的影响。

第四，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缺少研究。以往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几乎都侧重于对成果本身的研究以及所谓规律特点研究，而对其过程很少进行认真的分析，有些所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研究，实际上也不过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时间脉络进行了梳理而已。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者自身的思想进行碰撞、融合和创新的过程。以对毛泽东的思想研究为例，所谓过程的研究，是指对包括毛泽东阅读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本，以及面对这些文本时，他吸收了什么，扬弃了什么，这样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等在内的毛泽东思想历程的研究。当然，这样做的难度会很大，但我相信，只有通过对每一思想形成过程的微观研究，才能为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才能对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进行反思提供思想基础。具体来说，这一历史过程实际上包

含了五项内容：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普及和消化的历史过程；2. 用马克思主义阐述、重新解读和改造中国文化和进行学术研究的历史过程；3.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过程；4. 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历史过程；5.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第五，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研究比较片面。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的研究，目前学界除了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张闻天等领导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他相关人员的研究较少涉及。即使对上述领导人的研究，也更多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解决“怎么‘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主体，一是作为个体的主体。前者又可以分为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职业、专长或爱好的学界知识分子群体、中共党内的以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中共党内各阶层各方面的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理论宣传干部群体。后者就是指相对独立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的具体的个人。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研究，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立主体是“马克思、列宁”，而非别的什么人。理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即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过程”。[①]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看成是一个没有碰撞、没有变革、没有创造的自然历史过程。按照这种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共产党的四大理论，要么不具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创新性，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复，要么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因为两者在基本观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六，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尚不全面。过去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理论，以及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缺少更为宽广的视野，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发展过程。实际上，在上述成就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表现在一些领域，比如哲学、历史学、文艺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其主体也不只是上述那些领导人，还有以郭沫若、艾思奇、陈伯达、周谷城、范文澜等为代表的党内和党外的知识分子。另外，以往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评价明显存

① 张国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比较[J].探索，2007(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